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8.05.003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

付 宏,王建茗,张志伟,汪金伟

(湖北经济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武汉 430205)

摘要:2014年46号文的颁布使中国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形态被社会资本所关注。本文通过构建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3L”框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体育产业资本对海外不同体育产业资产类型的购买行为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不同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球员类资产和俱乐部类资产海外购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球员和俱乐部的海外购买都存在临界值,其中球员购买数量应当控制在44人以下,在顶级联赛保持外援政策稳定;俱乐部类资产购买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单调递增,应当给予支持,但要高度注意防范资本通过海外购买俱乐部资产进行转移和外流。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型升级;体育产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5-0022-12

中国体育产业目前面临的一个短板是体育产业中体育服务业领域的核心资源稀缺,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职业化程度不高,体育产业市场还处于培育初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直以来以竞技成绩导向为主所产生的“举国体制”和“锦标主义”导致体育产业要素不健全,尤其是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要素薄弱。2014年46号文的颁布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拐点,中国体育作为一个产业形态被社会资本所关注。近年来,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对体育产业资源的大规模收购和投资行为,其收购和投资对象包括俱乐部、赛事IP、转播权、体育产业公司、球员等,地域范围覆盖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巴西等全球主要体育产业资源输出地区。

那么,近三年来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能否促使中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和领域应当怎样调整?政府应当出台哪些相关政策对这些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这些将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对外直接投资与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第二部分构建本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解析关键概念;第三部分利用实证方法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经典研究更多的是从发达国家视角,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以及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

收稿日期:2018-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GL030);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院级科学研究项目(2018K10)

作者简介:付宏(1979-),男,湖北大悟人,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转型升级。

响。Akamatsu(1962)^[11]和Kojima(2010)^[12]主要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分析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现竞争力比较低的产业分阶段、分行业的转移投资是一个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行动因素,在转移过程中母国“劣势产业”逐渐移转,新兴产业崛起,母国产业结构日益优化。Cowling和Tomlinson(2003)^[13]指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可能导致母国重要产业空洞化的结果,因母国产业未形成前将成熟产业移至他国,由此引起母国核心重点产业的空缺,此现象将导致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困难。Dunning(1982)^[14]探讨了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地位和位置的变化,认为可通过折衷理论解释为何出现国际生产,他使用大约67个国家1967—1978年的资本存量数据,表明这些流动的决定因素与阶段和结构之间的系统关系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Dunning进一步在《跨国企业和全球经济》中提出了战略性资产的概念,阐述战略性资产的演变,包含金融资产、人力资源和国际销售网络等有形物质资产,也包含技术、知识、研发能力以及组织管理技能,各个国家皆需要大量的战略性资产,对于创新能力不足与技术水平落后的国家更为重要,因此战略性资产逐渐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

随后,也有大量学者的研究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母国产业升级的情况。Cantwell和Tolentino(1990)^[15]从技术再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视角指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外溢下可以获取、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与此同时会进行技术积累和创新,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和领先技术,带动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Dowling(2000)^[16]采用面板数据实证研究1970—1995年有经济发展差异的国家中的20多个行业,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良好手段,且对母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变迁和升级产生了积极的提升作用;Lipsey(2002)^[17]以爱尔兰新兴工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下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使母国经济产生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间品需求结构逆转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6)^[18]利用案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得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优化整体产业结构,提升投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空间的结论。Mathews(2006)^[19]研究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案例后提出“3L分析框架”(Linkage-Leverage-Learning Framework),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资源联系”(Linkage)、“杠杆效应”(Leverage)和“干中学”(Learning),从而获得产业间竞争优势,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冯春晓(2009)^[10]通过构建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指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母国产业结构优化。陈琳和朱明瑞(2015)^[11]采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从产业内和产业间升级两个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间升级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产业内的升级效果并不明显。

在体育经济学领域,明星球员的购买会对一个国家体育产业产生影响。Noll(1974)^[12]对1960—1970年美国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分析发现,在NBA、ABA和MLB中,球队的明星球员数量会影响比赛主场的观众人数。更重要的是电视媒体的发展提高了球星的曝光度,明星球员除能提高球队观众数量外,还有更大的外溢效果延伸至各个体育产业上。Hausman和Leonard(1997)^[13]指出超级球星有高报酬薪资结构,所拥有的待遇与薪资超过普通球员。例如,乔丹的NBA职业生涯为美国创造的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其中并不包含球赛门票收入,这种明显的产业外溢效果被称为“乔丹效应”。足球联赛上的明星球员效果也已被证实,Lucifora和Simmons(2003)^[14]研究意大利职业足球运动员工资决定因素时指出,球星个人生产力与薪酬的关系可能产生“超级巨星”的效果。在“超级巨星”效果下,运动员的边际收入生产力除了受到观众观看赛事的门票及转播费等正常支出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观众观看赛事的额外付出额度的影响。Rosen(1981)^[15]认为确实存在巨星效果,因为科技进步使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有能力获得更大的市场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上巨星外溢效果的不断强化,将排挤能力较低的人获利,从而产生对体育市场的垄断与影响力。Berri和Schmidt(2006)^[16]进一步证明发现,明星效果确实存在外部性的影响,客场的观众也受到明星效果的影响。排名全联

盟前25名的全明星球员上场能够吸引4353名观众入场观看比赛,这种明星球员若帮球队获胜更能吸引9846名观众入场观看比赛。这表示比起明星球员名气的影响,明星球员的实际表现更能够吸引观众关注比赛。杨铄等(2016)^[17]考察部分足球发达国家外援制度安排的发展沿革后发现,高水平职业足球赛事必须兼具开放、包容和竞争性三面均衡的外援制度。因此,建议分阶段放宽我国职业足球的职业外援配额限制。

国内学者更多从体育产业政策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开展研究。杨越(2015)^[18]通过2004—2013年体育产业统计的横向和纵向对比,认为体育用品产业、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以及面向就业人群的体育健康产业为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任海(2015)^[19]指出,体育产业转型发展的挑战在于不仅要强调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更要强调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依法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杨强(2015)^[20]从探索体育与相关政府部门规制改革、出台体育产业融合政策与规范标准、设立国家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大力支持体育企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促进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姜同仁(2016)^[21]认为通过推动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保障产业发展的动力,进而增强“自下而上”激发产业发展的活力,他还强调体育产业调整的技术路线应源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理对接。

综合已有的文献分析,多数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多数研究是从产业结构的宏观层面以及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角度展开的,对于体育产业等新产业形态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还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中国体育产业,着重从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足球项目入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

二、基本分析框架构建

(一)基本机制路径框架

本文的基本机制路径框架将整合邓宁的战略性资产理论和Mathews的“3L”分析框架(图1)。“3L”框架从体育产业层面解释体育产业资本对外直接投资支撑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机制,即通过资源联系、杠杆作用、学习(干中学)以获取外部(国外)体育产业战略性资产,产生后发优势,进而实现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期,在全球体育产业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是体育产业领域中典型的后发国家,因此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获得海外各种体育产业资产,通过收购的资产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取得资源联系,获得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稀缺的产业核心资源,即战略性资产,进而通过这些战略性资产进一步撬动我国体育产业市场需求,扩大体育产业规模和提升体育产业竞争力。当然,我国体育企业由于在体育产业领域中属于后入企业,因此需要在运营这些战略性资产以及发挥这些战略性资产杠杆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累积经验,从而实现企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后发优势,最终推动中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

(二)关键概念解析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指一国投资者(各类型厂商主体)旨在获取国外企业经营、管理和治理等方面的控制权而开展的面向境外国家或地区的跨国资本、劳动力、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转移行为。《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2004)给出的对外直接投资定义如下: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结合体育产业的特征,本研究综合以上两种定义,即体育产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各类型企业主体)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境外设立、购买境外企业10%以上股权的,以及通过转会方式购买球员(运动员)的经济活动。因此,本研究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包括我国企业购买境外体育产业企业或资产的收购行为,也包括购买境外球员的转会交易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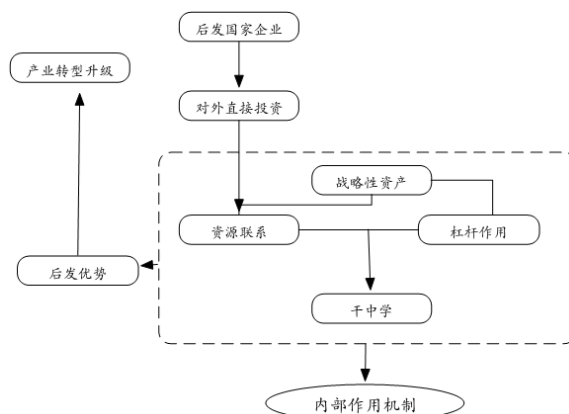


图1 “3L”分析框架图

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是产业从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提升过程,是产业竞争力全面升级和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产业转型升级度量标准很多,包括一、二、三产业比例,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等指标。本研究中定义的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是指我国体育产业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的上升过程,使用体育产业投资规模为度量指标。

第三,体育产业。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将体育产业范围确定为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体育培训与教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十一大类。本研究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体育产业统计分类的标准,将体育产业划分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其中体育用品制造业主要包含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体育服务业则涵盖其他领域。

三、对外直接投资与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体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1.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发展

近年来,我国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市场的对外投资行为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企业在海外体育领域的收购和投资总额从约400万美元飙升到了近14亿美元。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正在体育资产上如火如荼地展开,更成为海外并购增长最快的领域。笔者统计了自2014年46号文颁布以来我国资本在体育产业国际市场上的主要投资行为,发现投资总金额达到近百亿美元。投资范围包括俱乐部、赛事IP、赛事转播权、企业、球员等多种体育产业资源;投资地域范围覆盖欧洲、美洲、亚洲,主要投资区域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体育产业发达国家;投资项目主要是足球和篮球,涉及足球项目投资占主要部分;投资主体既包括万达、苏宁、阿里巴巴等国内超级企业,也包括大量的投资基金,其中也有一些自然人的投资行为。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国外球员进入国内联赛,提升了比赛质量和球队成绩以及球队收入(见表1)。以中超球队在亚洲及世界俱乐部赛事成绩为例,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两次获得亚洲俱乐部冠军联赛冠军,两次参加世界俱乐部冠军杯赛。2018年,两支中超球队进入东亚区四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外援水平密切相关。同时,高水平外援的引入提升了比赛质量。球员作为比赛投入的基本要素,其水平决定比赛产出的质量,而高身价的国外球员显然是比赛质量提升的直接贡献因素。国外球员的明星效应吸引了大量球迷,对

于增加消费者数量和俱乐部收入有直接作用。体育产业中的明星效应是俱乐部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例如,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加盟美国职业大联盟洛杉矶银河队,短时间内使该联盟和俱乐部全球知名,虽然贝克汉姆上场次数不多,但该俱乐部拥有了大量来自全球的球迷消费者。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2013年买入当年巴甲联赛MVP孔卡,不仅使球队实力得到显著提升,而且使主场入场人数翻倍。由此可见,明星球员通过其名气吸引了大量球迷,显著增加了入场人数,直接增加了球队俱乐部门票收入,成为球队俱乐部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因素。

表1 近15年中超球队亚冠小组赛(正赛)积分、外援进球比例与出线情况

年度	参赛球队数量	总积分	平均积分	外援进球比例(%)	出线球队数量	最佳战绩
2003	2	13	6.5	82	1	4强
2004	2	25	12.5	47	1	8强
2005	2	36	18.0	81	2	4强
2006	2	21	10.5	94	1	8强
2007	2	18	9.0	68	0	小组赛
2008	2	24	12.0	63	0	小组赛
2009	4	28	7.0	52	0	小组赛
2010	4	22	5.5	60	1	16强
2011	4	24	6.0	61	1	16强
2012	3	22	7.3	40	1	8强
2013	4	54	13.5	29	2	冠军
2014	4	31	7.8	41	1	8强
2015	4	44	11.1	45	2	冠军
2016	4	47	11.8	40	2	8强
2017	3	37	12.3	65	3	4强

2. 我国体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第一,收购资产主要处于体育产业链上游。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标的分别是球员、俱乐部和赛事IP,这些资产都属于体育产业中的战略性资产,具有体育产业的原料属性,属于体育产业链上游(见图2)。例如,万达收购欧洲盈方体育传媒集团、美国世界铁人公司,腾讯购买NBA体育赛事IP,中欧体育、海峡基金收购AC米兰,苏宁收购国际米兰,雷曼集团收购纽卡斯尔喷气机;球员购买有上海上港收购胡尔克和奥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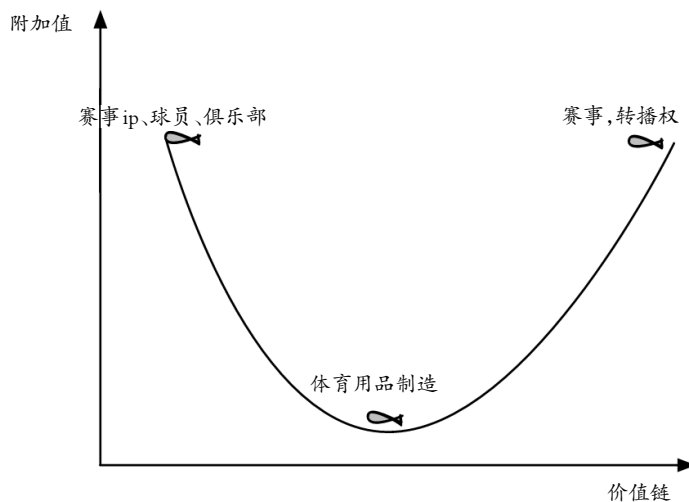


图2 体育产业微笑曲线

第二,收购资产的地理范围主要位于欧洲。从世界体育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发达地区主要在欧洲和北美(主要是美国)地区,但是从体育项目来看,欧洲地区主要是以足球为主,北美(美国)地区主要是篮球、橄榄球、冰球、棒球等项目。由于我国体育产业消费的主要项目是足球和篮球,这两个项目也是产业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列的项目,因此,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范围在欧洲,美国市场也正在进入,但主要是以入股形式进入NBA球队。

第三,收购成交价格绝大多数是溢价收购。体育产业战略性资产主要来自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我国体育产业市场需求而言,体育产业资源供给是稀缺的,在我国体育产业自身战略性资产存量较少的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资本的收购价格绝大多数都高于标的资产的当期市场评估价格(见表2)。2017年,中超冬窗排名前10的转会中,总共产生的转会费高达1.7079亿欧元。而国际知名网站“转会市场”对这10名球员总身价的估价为7335万欧元。这10人的溢价就高达9744万欧元。

表2 近3年主要中超外援国际转会溢价情况

序号	球员	转出方(国别)	转入方	身价	转会费	溢价率(%)
1	帕托	比利亚雷亚尔(西班牙)	天津权健	600	1800	200.0
2	阿兰	萨尔茨堡红牛(奥地利)	广州恒大	400	1110	177.5
3	权敬源	阿赫利(阿联酋)	天津权健	400	1060	165.0
4	乌贾	云达不莱梅(德国)	辽宁宏运	550	1150	109.0
5	伊哈洛	沃特福德(英国)	长春亚泰	1200	2330	94.2
6	特谢拉	顿涅茨克矿工(乌克兰)	江苏苏宁	2680	5000	86.7
7	胡尔克	泽尼特(俄罗斯)	上海上港	3050	5580	82.8
8	奥斯卡	切尔西(英国)	上海上港	3500	6000	71.4
9	J·马丁内斯	马德里竞技(西班牙)	广州恒大	3000	4200	40.0
10	佩莱	南安普顿(英国)	山东鲁能	1100	1525	38.6

注:球员身价以德国《转会市场》当期评估价格为准,转会费以公告价格为准,单位为万欧元

第四,收购的主要方式是现金收购。产业资本收购的方式主要有现金收购、技术入股、资产重组等,但对海外体育产业资产来说,国内体育产业资本的主要收购方式是现金,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体育产业资源相对落后,因此除了现金收购方式外,其他收购方式不能满足其需求。

第五,国内收购方主要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主要集中在互联网、房地产等产业领域。体育产业收购属于重资产收购,对收购方的资金要求较高,从目前国内产业发展情况来看,资本积累较多、流动资金相对充裕的主动收购方主要是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而且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互联网产业领域,例如万达、恒大、阿里巴巴等。

(二)不同资产类型购买与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分析

1. 基本模型

本文建立一个模型讨论国外球员投资与国外俱乐部投资对国内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参考Desai等(2009)与李磊等(2016)的对外投资模型,进一步将其应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行为。

考虑一个体育产业产出模型, $Q(I, I^p, I^c)$ 为第三级体育产业(服务性体育产业)产量占有所有运动产业产量的比例,产量比例受到体育产业投资影响。 I 表示国内第三级体育产业的投资量, I^p 为国内体育企业对国外球员投资量, I^c 为国内企业对国外球团俱乐部的投资量。显然第三级体育产业产量受投资影响,并且其关系 $\partial Q/\partial I > 0$, $\partial Q/\partial I^p > 0$, $\partial Q/\partial I^c > 0$ 。换言之,投资增加将使服务性体育产量占有所有运动产业产量的比例上升。

若服务性体育产业产量会直接反映体育产业的总产值, 本文将 $R(Q)$ 视为体育产业的总产值, 因此 $\partial R/\partial I > 0$ 。体育产业在做相关投资时必须负担其成本, 国内第三级体育产业投资的单位成本为 c , 国内体育企业对国外球员投资的单位投资成本为 c^p , 国内企业对国外球团俱乐部的投资单位成本是 c^c , 整个产业的总投资成本将是 $cI + c^p I^p + c^c I^c$ 。

体育产业投资下的总利润为

$$R(Q) - (cI + c^p I^p + c^c I^c) \quad (1)$$

经由上式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下的一阶条件,

$$\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 Q}{\partial I} = c \quad (2)$$

$$\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 Q}{\partial I^p} = c^p \quad (3)$$

$$\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 Q}{\partial I^c} = c^c \quad (4)$$

由一阶条件发现, 边际成本 c 、 c^p 、 c^c 将影响投资 I 、 I^p 、 I^c , 而我们知道 dI 是国内第三级体育产业的投资总变动量, 是受到国内体育企业对国外球员投资的总变动量 dI^p 与国内企业对国外球团俱乐部投资的总变动量 dI^c 的影响。

通过对(1)式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下式:

$$\frac{\partial R}{\partial Q} \left[\frac{\partial^2 Q}{\partial I^2} dI +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dI^p +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dI^c \right] + \frac{\partial Q}{\partial I}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left[\frac{\partial Q}{\partial I} dI + \frac{\partial Q}{\partial I^p} dI^p + \frac{\partial Q}{\partial I^c} dI^c \right] = dc$$

知道 $dc = 0$, 上式可以改写为:

$$dI = \frac{\left[\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 \frac{\partial Q}{\partial I^p} \frac{\partial Q}{\partial I}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right] dI^p + \left[\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 \frac{\partial Q}{\partial I^c} \frac{\partial Q}{\partial I}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right] dI^c}{-\left[\frac{\partial R}{\partial Q} \frac{\partial^2 Q}{\partial I^2} + \left[\frac{\partial Q}{\partial I} \right]^2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right]} \quad (5)$$

因为 $\frac{\partial^2 Q}{\partial I^2} < 0$ 且 $\frac{\partial^2 R}{\partial Q^2} \leq 0$, 发现(5)式等号右边分母项为恒大于零。等式右边分子项 $\frac{\partial R}{\partial Q} > 0$, 因此分子项的正负效果必须取决于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与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若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或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其中一项或两项皆充分大于零, 分子项才有可能为正。这说明外国投资影响国内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量为正时, 此两类投资为互补品的特征结构; 相反, 若外国投资影响国内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化量为负时, 此两类投资为替代品的特征结构。

综上所述, 直接投资国外球员与扩大国外俱乐部需求对母国体育产业升级的影响渠道可以经由影响国内体育投资而实现, 但通过这两项国外投资会因产品(球员和俱乐部)特性的差异对国内体育投资产生替代或互补效果。本文发现,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可能存在一个临界值效果, 当购买国外球员小于临界值时对于国内投资是互补效果, 即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 0$; 当国外球员投资过多时此效果就会反转, 出现替代效果, 即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 0$, 表明购买过量的国外球员排挤了国内体育产业内体育培训与教育规模, 进一步降低产业转型升级效果。而国外俱乐部购买与国内体育产业投资具有强烈互补效应, 即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 0$, 因为国外俱乐部购买能从国外俱乐部学习到新的管理经营与技术, 高质量外溢效果对国内体育产业投资产生高水平的规模产业转型升级。

2. 数据设定与检验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中国产业信息网和作者自己整理的2015—2016年中超国际球员转会与国内资本收购国外体育俱乐部数据。由于数据来源受到限制及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尚不完善,本文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15年的国家体育总产出以及增加值为基础,推测其他年度体育产业总产出及增加值(见表3)。

数据处理方式如下:2015年数据由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13年数据根据网上公布的资料收集整理得到,其中总产值和增加值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网络公布数据得到,具体产业结构比例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到;2014数据总产值和增加值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公布数据得到,而其中产业结构比例是由2013年和2015年的真实数据加权平均得到;由于2016年数据目前官方尚未公开,本文以国家体育十三五规划目标在2015年的基础上倒推得到^①。

表3 2013—2016年我国体育总产出以及增加值

年份	指标 类别		服务性体育产业							制造性体育产业			总计	
			体育管理活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建设休闲活动	体育场馆服务	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培训与教育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贸易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2013	总量 (亿元)	总产出	81.1	56.2	99.8	312.0	18.7	87.4	37.4	106.1	7722.0	2365.0	116.5	11000.0
		增加值	42.4	20.2	48.5	167.8	6.1	70.7	14.1	50.5	1936.0	1100.4	106.9	3563.0
	结构 (%)	总产出	0.7	0.5	0.9	2.8	0.2	0.8	0.3	1.0	70.2	21.5	1.1	100.0
		增加值	1.2	0.6	1.4	4.7	0.2	2.0	0.4	1.4	54.3	30.9	3.0	100.0
	产业结构占比 (%)	11.8							88.2					
2014	总量 (亿元)	总产出	138.3	95.7	170.2	531.9	31.9	148.9	63.8	180.8	9224.1	2850.7	129.1	13574.8
		增加值	66.4	31.2	75.5	263.3	9.0	110.7	22.7	79.6	2112.0	1198.1	72.7	3563.0
	结构 (%)	总产出	0.7	0.5	0.9	2.8	0.2	0.8	0.3	1.0	70.2	21.5	1.1	100.0
		增加值	1.6	0.8	1.9	6.5	0.2	2.7	0.6	2.0	52.3	29.7	1.8	100.0
	产业结构占比 (%)	16.3							83.7					
2015	总量 (亿元)	总产出	229.1	149.5	276.9	856.2	47.0	247.6	100.0	299.0	11238.2	3508.3	155.2	17107.0
		增加值	115.0	52.6	129.4	458.1	14.0	191.8	40.8	139.6	2755.5	1562.4	35.3	5494.4
	结构 (%)	总产出	1.3	0.9	1.6	5.0	0.3	1.4	0.6	1.7	65.7	20.5	0.9	100.0
		增加值	2.1	1.0	2.4	8.3	0.3	3.5	0.7	2.5	50.2	28.4	0.6	100.0
	产业结构占比 (%)	20.8							79.2					
2016	总量 (亿元)	总产出	256.4	167.3	309.9	958.1	52.6	277.1	111.9	334.6	12575.5	3925.8	173.7	19142.7
		增加值	213.8	97.8	240.6	851.7	26.0	356.6	75.9	259.5	3386.0	1919.9	43.4	7471.0
	结构 (%)	总产出	1.3	0.9	1.6	5.0	0.3	1.4	0.6	1.7	65.7	20.5	0.9	100.0
		增加值	2.9	1.3	3.2	11.4	0.3	4.8	1.0	3.5	45.3	25.7	0.6	100.0
	产业结构占比 (%)	28.4							71.6					

国外球员转会以及俱乐部并购以2015—2016年为分析年度,以2015—2016年购买国外球员(转会)以及俱乐部并购数据作为检验基础。利用所收集到的体育产业数据对基本模型中式(5)进行估算,估计国内体育产业成长所需收购国外球员以及俱乐部并购所能带来的影响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指标	年份	2015	2016
球员购买数 ^②		44	41
俱乐部购买数 ^③		5	9
$(\partial Q)_{2014}$		6.096	6.788
$(c\partial I)_{2014}$		562.9	843.6
$(\partial Q/c\partial I)_{2014}$		0.011	0.008
购买国外球员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0.0001	0.001
$(\partial Q)_{2015}$		6.788	13.402
$(c\partial I)_{2015}$		843.6	262.4
$(\partial Q/c\partial I)_{2015}$		0.008	0.051
购买国外俱乐部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0.0006	0.0048

表4中 $(\partial Q)_{2014}$ 表示2014年第三级体育产业(服务性体育产业)产量占有所有体育产业产量比例的变化值,意味着该年第三级体育产业占比上升6.096%;以此类推, $(\partial Q)_{2015}$ 表示2015年第三级体育产业占比上升6.788%, $(\partial Q)_{2016}$ 则说明2016年第三级体育产业占比增加13.402%。接着, $(c\partial I)_{2014}$ 表示国内第三级体育产业的投资增额,意味相较于前一年,该年国内对于第三级体育产业投资的总额度增加了562.9(亿元);同理, $(c\partial I)_{2015}$ 说明2015年较2014年多投资843.6(亿元),而 $(c\partial I)_{2016}$ 则表明2016年较2015年国内对于第三级体育产业只多投资262.4(亿元)。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当年国内对于第三级体育产业投资增加额对于国内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影响程度: $(\partial Q/c\partial I)_{2014}$ 表示2014年影响程度为1.1%, $(\partial Q/c\partial I)_{2015}$ 表示2015年造成的影响稍微减少至0.8%, $(\partial Q/c\partial I)_{2016}$ 表示2016年影响程度上升至5.1%。再利用国外球员购买数量与国外俱乐部购买数量作为 ∂I^p 与 ∂I^c 的估计,其中2015年国外球员购买为44人、国外俱乐部购买为5家,2016年国外球员购买为41人,国外俱乐部购买为9家。由变数的估算说明2015年、2016年购买国外球员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和购买国外俱乐部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即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p}$ 与 $\frac{\partial^2 Q}{\partial I \partial I^c}$ 。可以发现,2015年购买国外球员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为-0.01%;但2016年减少了国外球员购买,该年购买国外球员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为0.1%。在俱乐部购买方面,2015—2016年俱乐部购买从5家增加至9家,本文估算结果发现,购买国外俱乐部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由替代转为互补,数值显示2015年效果为-0.06%,而2016年的效果为0.48%。

3. 影响效果总结

国内资金在体育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包含国外球员投资和国外俱乐部投资。此部分总结体育产业对外投资对国内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利用国内体育服务业的投资量衡量产业转型升级的力度,重点说明对外投资的资产类型对国内体育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其中,资产类型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作用有不同效果。本文着重分析国外球员转会和国外俱乐部投资对国内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

第一,球员效应。估计结果显示,2015年国外球员购买数量为44人,当年的国外球员投资量对于国内投资于服务型体育存在替代效应(-0.01%),说明购买过多的国外球员导致国内服务型体育产业投资量下降。当2016年国外球员购买数量下降至41人时,当年国外球员投资量对于国内投资于服务型体育存在互补效

应(0.1%),说明国外球员投资将带动国内服务型产业投资的增加。估计结果明显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理论推论球员效应存在一个临界值,高于临界值时国外球员投资将不利于国内服务型体育产业的升级。以现有数据,本文比较2015—2016年国外球员购买的数量下降而球员效应替代转为互补效应,明显支持国内若是投资过多的国外球员将不利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升级。但若适度调整国外球员购买的数量,将仍有利于国内体育产业的升级。

本文从提升国内体育产业升级的角度建议,国外球员效应规模应处于购买国外球员为43人以内,如此才会对体育产业投资规模产生增量效果,而超过43人(2015年数据显示)会对体育产业投资规模产生替代效果,国内投资于服务型体育产业绝对值将减少。所以,投资国外球员数增加对国内体育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先互补效应后替代效应,其主要原因是购买过量的国外球员排挤了国内体育产业的体育培训与教育规模,进一步降低了产业升级效果。

第二,俱乐部效应。在投资国外俱乐部效应方面,2015—2016年国外俱乐部投资从5家增加至9家,估算结果显示购买国外俱乐部对国内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由替代转为互补,数值显示2015年效应为-0.06%而2016年的效应为0.48%,说明少量的国外俱乐部投资达不到FDI外溢规模,相反可能不利于国内产业升级。所以,由本文收集的2015年数据发现5家国外俱乐部投资是不具规模的(替代效应),反而进一步排挤了国内投资,而在2016年数据中,当国外俱乐部投资扩张至9家时其FDI的外溢效应开始产生,带动国内服务型体育产业的投资(互补效应)。

此发现说明我们理论上的假定与数据分析的俱乐部效应是一致的,俱乐部购买对体育产业投资规模产生单调增量效果,但是存在一个规模效果的门槛值,只有当国外俱乐部投资数量足够多时,俱乐部效应才能由原本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转变为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外俱乐部购买能从国外俱乐部学习到新的管理经营与技术,高质量外溢效果对国内体育产业投资产生高水平的规模产业升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体育产业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第一,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符合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升级的需求。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短板是战略性资产存量少,体育产业市场发育处于初级阶段。体育产业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短时间内为我国体育产业引入球员、赛事、俱乐部、先进管理经验等体育产业战略性资产,补齐我国体育产业短板,对于支持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第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扩大我国体育产业市场范围,加快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的步伐,增强我国体育产业与世界高级体育产业资源的联系,更好、更快融入全球体育产业市场大格局。

第三,体育服务业是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服务业属性要求体育服务业加深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资本则是产生产业联系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体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加强体育产业与其他关联产业的产业联系,更好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二)球员类资产购买应切实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本文的估计结果来看,国际球员进入中国足球联赛对我国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需要合理控制国外球员的数量区间。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在球员类资产购买行为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一方面保证联赛产品供给质量,另一方面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从国际上主流联赛的运营经验来看,球员转会会是体育产业市场上的一个普遍行为,明星球员自然拥有较高的身价,也能为球队带来更多胜利和提升球迷观赛感受。但其负面作用可能是限制本土球员的出场机会,进而影响本国足球竞技水平。本文的研究结

论表明, 适量规模的国外球员转会会对体育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但超过适量规模后, 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就会产生负向作用。因此, 政府主管部门既要认识到明星球员的高身价和高薪酬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在调控体育产业市场上的管制作用。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区别对待不同层级联赛外援引进政策, 对于顶级联赛应主要注重其比赛产品供给质量, 在顶级联赛保持外援政策稳定性, 当前的“报名上场3人次”政策正好处于适量规模临界值, 建议长期稳定保持。对于次级联赛应主要注重人才培养功能, 建议将国外球员数量限制在2人以下, 并对转会费和薪酬实行最高限价, 将次级联赛打造为人才蓄水池。

(三) 体育产业资本购买国外俱乐部资产行为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但要高度关注由此产生的资本外流风险

我国体育产业资本近三年来对国外俱乐部资产的购买行为迅速增加, 一方面国外俱乐部具有体育产业的战略性资源, 能在很大程度上补齐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短板, 但另一方面不排除部分资本利用购买国外俱乐部转移外流资本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年度购买国外俱乐部数量的增加, 海外购买俱乐部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体育产业转型升级作用递增, 由负向作用逐渐转为正向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购买海外俱乐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应当给予支持, 理由是其能够引进国外体育产业先进管理运营经验,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以及为国内体育产业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赛事产品。但是, 从资本外流的角度来看, 由于国外俱乐部估值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而且当前购买行为的标的额巨大, 内在风险也在随着购买标的额的上升而上升, 因此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管制措施, 加强对体育产业资本购买国外俱乐部的监管, 防止资本转移和外流。

注 释:

- ① 十三五规划当中2020年规划总产值3万亿, 则在2015年基础上要求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1.9%; 在结构上体育服务业占比大于30%, 则在2015年基础上要求体育服务业年增长率不低于7.6%。
- ② 本研究中所购买的球员仅指转会费大于零, 且从境外俱乐部永久转会到国内俱乐部的外籍球员, 不包括租借、自由转会、国内球员转会的情况。
- ③ 本研究中所购买的俱乐部仅指国内资本购买的境外俱乐部。

参考文献:

- [1] Akamatsu, Kaname.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62, (1): 3-25.
- [2]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Routledge, 2010.
- [3] Cowling K, Tomlinson PR.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Hollowing out in Japan: Lesson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Policy[J]. *Urban and Regional Prosperity in a Globalised Economy*. 2003, (7): 33-58.
- [4] Dunning, John 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1981, (1): 30-64.
- [5] Cantwell, John, Paz Estrella E. Tolentino.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 University of Read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990: 139
- [6] Dowling M, Cheang CT.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0, (4): 443-63.
- [7] Lipsey RE. Home-and Host-country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In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Analyzing the Economics*, 2004, (2): 333-382.
- [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R]. UN, 2006.
- [9] Mathews, J.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1): 5-27.

- [10] 冯春晓.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9,(8):97-104.
- [11] 陈琳,朱明瑞.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产业间和产业内升级的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15,(6):116-121.
- [12] Noll RG. Attendance and Price Setting[J].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NOMICS, 2001, (135):165-207.
- [13] Hausman, Jerry A., Gregory K. Leonard. Superstars in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Economic value and policy[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7,(4):586-624.
- [14] Lucifora, Claudio, Rob Simmons. Superstar Effects in Sport: Evidence from Italian Soccer[J].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 2003, (41): 35-55.
- [15] Rosen, Sherwi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5): 845-858.
- [16] Berri, David J., Martin B. Schmidt. On the Road with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s Superstar Externality[J]. 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2006,(74): 347-358.
- [17] 杨铄,冷唐蕴,郑芳.职业足球联赛外援配额制度研究[J].体育科学,2016,(12):18-29.
- [18] 杨越.我国体育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重点分析——基于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调查研究[J].体育科学,2015,(11):24-29.
- [19] 任海.论体育产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5,(11):13-18.
- [20] 杨强.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机制与重构模式研究[J].体育科学,2015,(7):3-9.
- [21] 姜同仁.新常态下中国体育产业政策调整研究[J].体育科学,2016,(4):33-41.

(责任编辑:许桃芳)